



早期澳门

◎ 金国平 吴志良 著

ZAOQIAOMEN
SHILUN

史論

廣東省出版集團
广东人民出版社

早期澳门史论

◎金国平 吴志良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早期澳门史论/金国平, 吴志良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218-05549-7

I. 早… II. ①金…②吴… III. 澳门—地方史—研究
IV. K296.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1943 号

责任编辑	赵殿红 韦 羽
封面设计	张周永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广州市穗彩彩印厂 (厂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村十三社西乡工业区)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9.75
插 页	1
字 数	450 千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8-05549-7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020—37579695】

前言：澳门的历史意义和作用

澳门由于独特的历史发展，演变成为了中西交流的桥梁和葡文化的交汇点，并在中国近现代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本文拟结合最新挖掘的资料，从更加宽阔的历史场景，再次探讨澳门开埠的历史背景以及澳门港的性质，继而深入展开讨论澳门的历史意义和作用。

一、西力东渐：西风压倒东风

众所周知，15 世纪欧亚板块的东西两端出现了三项历史上的伟大航海活动：1405—1433 年间郑和七下西洋^①、1492 年新世界的发现及 1498 年欧洲通往印度海路的开通。15 世纪末贯通欧亚海上航线的开通，开始了东西方真正大规模、高频率的交流，在某种程度上也深刻影响了世界未来 500 年发展的方向和改

^① 《中国 15 世纪的海上扩张》，载《澳门杂志》葡文版，第 13 期，第 3 系列，2003 年 2 月，第 98—112 页。

变了东西方关系的平衡，预示着世界中心的逐步转移，成为西方中心兴起、中国或东方中心衰落的重要分界线。如果说 1510 年葡萄牙人占领印度果阿^①创建其东方帝国的大本营代表着西方势力正式侵入亚洲，那么，中华帝国的朝贡国满刺加 1511 年为葡人所占，则是天朝中心解体的起点。

在中国对外关系史上，明朝（1368—1644）也是极其重要的发展和转折时期。明代是中国近代史、也是世界近代史的开始。然而，至 15 世纪，中华帝国依然沉醉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乌托邦中，并想尽一切办法以怀德为上，以德化夷，在周边和海外国家确立自己作为“天下共主”的形象，而“四夷宾服、万国来朝”便是最能反映此一形象的重要标志。郑和耗尽国库七下西洋，“耀兵异域，示中国之富强”的最大目的，也为了树立这么一个形象。

中国既不对外兴兵，又以什么来维持“四夷宾服”、“天下共主”的局面呢？答案是朝贡制度。朝贡制度源远流长，是天朝帝国“与国内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的联系方式，也是中国封建王朝与外国政治关系的基本模式”^②。一言蔽之，是开启国门的钥匙。

此一天朝体制在初创、发展时期的确发挥了对外政策应有的积极作用，尤其在推动帝国与周边国家传统宗藩关系上成效显著。朝贡体制不仅是一套政治外交制度，事实上，它在涉外关系上的作用远大于此：其一是在中国境外发生武装冲突之时，以周边的朝贡国作为战场的前线；其二是有效避免外国势力渗透中国的防线。换言之，朝贡制度既是天朝发展对外关系的门户，又是

^① 《郑和航海图》上作“缠打兀儿”。为果阿土名 Sindabur 的对音。

^② 陈尚胜：《开放与闭关：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91 页。

保护帝国的防火墙。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万国之所以来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厚往薄来”的最优惠国待遇，利用朝贡机会跟帝国贸易。对藩属国来说，朝贡制度的经济价值远大于政治意义。因此，朝贡制度不仅具有这种极为严重的内在矛盾性，还由于它以我为主、唯我独尊的内在逻辑大大局限、妨碍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正常认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想像帝国可以制定出一套审时度势的外交政策，也不可能跟随形势变化调整朝贡体制下的地缘政治关系。随着陌生的国家远来并形成新的国际格局，天朝处理中外关系时已经从主动转向被动应对，朝贡制度也受到正面冲击并逐渐走向解体。

实际上，自从郑和下西洋之终结，明朝便在南洋失去了影响力。最初由穆斯林取而代之，后来葡人逐渐控制了原属天朝势力范围的地区，一步一步地实现葡萄牙东方帝国的梦想。

达伽马概括了葡人东来的追求：寻找胡椒与基督徒，因此，追踪胡椒和其他香料的海舶也带来了寻找基督徒和教化异邦的传教士，经济与宗教成为了欧洲海外扩张的两大动力。这两股动力，是郑和下西洋的动因所无法比拟的，其攻击性和征服欲亦是此前来朝“万国”所未有的。欧洲人凭借强大的军事优势，在普世性的天主教精神的感召下，进入印度洋，征服伊斯兰世界，占据马六甲，令天朝面临前所未见的新局势。这时，西风压倒东风之历史进程已经开始。

葡人东来，最早只不过欲进入朝贡制度，以期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值得注意的是，葡人的出现对天朝解体产生了催化作用。他们攻占满刺加破坏了南洋地缘政治的平衡，切断了中国产品营销印度洋的去路，中国在该地区的传统领导地位受到了严重

的盛况，标榜正统，有利于笼络人心，巩固自己的统治”^①。

“成祖译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朱棣是以庶篡嫡夺权登基的，在当时宗法制度下，在名分上是冒天下大不韪的事，永乐极欲借国外内向，标榜正统，以安国内人心”^②。

“‘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是为巩固明朝的统治地位服务的。被明朝取代的元朝是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国际影响较大，派遣郑和下西洋，有利于在西洋树立明朝声威，消除元朝影响；同时，盘踞在中亚的蒙古帖木儿帝国，仍威胁明朝的安全，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可以从侧翼牵制他们，创造东南安谧的局面，有利于集中力量对付西北方面时常进扰的蒙古贵族”^③。

就其经济目的而言，郑和七下西洋破费浩繁，致使“库藏为虚”。而他带来的是仅供皇室、贵族、官僚享用的奇珍异宝、香料补药。郑和下西洋的经济实质，是国家对外贸的垄断。与葡萄牙倡兴航海、拓展海外事业的政策相反，明朝仍采取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阻碍工、商业的发展。朱明抑商政策在对外贸易上的反应便是海禁。倭寇之乱虽为海禁政策形成的直接原因，但远非其根本原因。国家垄断及海禁极大地打击了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自然经济。总之，政治目的可成为强大的动因，但它远不如经济动因持久稳定。事过境迁，政治目的一旦消失，远航便失去了动因。正统之后，郑和的航海失去了此种政治经济动因，因而让位与东来的葡人。郑和船队停航后，朝廷失去了获得舶来品的官方渠道，海禁仍未消除，国际贸易完全绝禁。这为远航东

① 张深：《试论郑和下西洋终止的原因》，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

② 杨禧：《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及其被停航的原因》，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27页。

③ 《试论郑和下西洋终止的原因》，第19页。

明末耶稣会士东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不谓不狭隘。以中华文明为圆心，将外部世界划为两个同心圆：周边已知的朝贡国；化外未知的“蛮夷”。华夏文明有礼，而“蛮夷”不知礼仪。华夏观念加上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历朝历代对外关系的指导模式，由此产生了一种畸形的对外心态。葡萄牙及欧洲首位遣华大使皮莱资获得接见前被迫习礼，便是典型的例子：

“三堂总镇太监宁诚、总兵武定侯郭勋俱至。其头目远迎，俱不拜跪。总督都御史陈金独后至，将通事责治二十棍，吩咐提举：远夷慕义而来，不知天朝礼仪，我系朝廷重臣，着他去光孝寺^①习礼三日方见。第一日始跪左腿，第二日跪右腿，三日才磕头，始引见。”^②

佛郎机进入中国沿海、特别是据居澳门后，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以澳门为基地，开始其“中国长征”，将世界地图、“五大洲”、“地圆说”等世界地理知识输入了中国，向国人介绍了与华夏秩序截然不同的新世界图景，才引发国人世界观的逐渐改变。

华夏文明既然甲冠“天下”，蛮夷当无师习之处。佛郎机虽然名不见经传，却居然到了国门之下，而堂堂朝廷命官却不知他们从何而来。这一冲击非同小可。国人心中暗惊：蛮夷万里而来，必有长技。接待葡人使团的顾应祥详细记录了“佛郎机銃”。“放銃三个，城中尽惊。”御史何鳌惊呼：“佛郎机最凶狡，兵械

① 伯希和：《明史上的火者及写亦虎仙》（*Le Hoja et le Sayyid Husain de l'histoire des Ming*），载《通报》第39期，莱顿，1949年，第92页注释12及第113页注释47。

② 《静虚斋惜阴录》卷一二《杂论》三，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64，子部，杂家类，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较诸蕃独精。”曾与葡人正面交战的汪鋐更称他们为“强番”。“唯我独尊”的观念受到冲击。

西方的坚船利炮首次展现在国人眼前，令人惊诧^①，而朝廷命官也由此产生了历史的危机感，并作出最本能的反应：取其长技，拒之于国门之外。从嘉靖朝起，中国大量仿造了当时堪称先进的佛郎机铳，用于北边抗虏、南方备倭。如不是“舶来货”佛郎机^②铳的威力，明朝的末日可能不是在崇祯朝，而是在嘉靖年间。

① 耶稣会的报道也证实当时华人认为葡萄牙人具有军事优势：“……葡萄牙船只的规模、他们的异乎寻常的装备、他们的大炮的轰鸣，都只能增加中国人内心的恐惧；而广东省的为数众多的回教徒也说服他们相信，他们的恐惧是有根据的。葡萄牙人首先抵达中国南方的海岸，那里的居民把他们叫做佛郎机（Franks），这是撒拉逊人（Saracen）对所有的欧洲人的称呼。但中国人在他们的语言中没有流音‘R’，而且从不使用中间没有元音的两个辅音，因此把这个字读成佛郎机（Falanci），在广东省至今仍然这样发音。他们后来又用同样这个名字称呼欧洲的武器。他们相信这些佛郎机人是强健的战士和各个国家的征服者。佛郎机的帝国是没有边境的，除非是到世界的尽头。”（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0页。）由于版本不同，译文也差异很大，我们根据德礼贤注释本作了新译，方便读者参考：“澳门是一个葡萄牙人的城市，位于广东省的海滨。它是一地峡型的半岛，周长2至3千步。葡萄牙人来到时，得知了（中国）这个王国的宏伟与富饶，千方百计欲与之贸易。但是，华人惧怕外人，尤其是见到葡萄牙人那样勇敢善战的人。葡萄牙人武器之精、船只之大，他们（华人）见所未见。他们最恐惧那些在中国从未见过的大炮。而在广州城的许多穆斯林异教徒又向华人说，他们称欧洲基督徒为佛郎机（Franchi），更增加了华人的恐惧（由于汉语无发‘R’的音，于是将其发音为Falanchi。亦以此名称呼大炮）。他们（葡萄牙人）是勇敢的人，喜欢征服别人的国家，并已得知他们以武力制服了马六甲和印度其他王国。”（德礼贤注释：《利玛窦全集》，国家出版社，罗马，1942年，第1卷，第149—150页。）那个时期担任广东布政司的蔡汝贤在其《东夷图说》中也称葡萄牙人“大都夷性凶狡嗜利，善制火铳，一发中人，无不立死，名佛郎机。中国仿其制以御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杨继波、吴志良、邓开颂总主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

② 佛郎机铳，葡语作“berço”。

由此可见，作为欧洲第一个出使赴华的皮莱资使团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广东当地官员甚至编造出了葡人食人的“黑色神话”^①，或许是为了杜绝葡人欲同北京建立直接联系的企图，避免地方当局得不到任何好处；或许是为了使葡人在中国沿海退走，因为任何未尽朝廷之意的对突发事件的不当处理都将威胁到他们的官位。其后近 30 年间，中葡中止了来往，明朝当局对外夷更加不信任并对他们增强了防范，完全关闭门户长达 10 年。这不仅损害了与传统朝贡国的政治、外交和商贸关系，又令葡人有机可乘，企图从中国沿海其他地方打开中国大门。更为消极负面的是，这严重影响了天朝的对外关系，中央帝国逐渐走向边缘，甚至被主流世界排斥在外。由于天朝无法适应新的环境和“国际秩序”，只好采取简单又简便的对策：闭关自守，续圆美梦。

有趣的是，葡萄牙人的坚船利炮所构成的军事优势，成为了后来明朝中国对葡萄牙人改剿为抚及开放澳门政策的基石。但面对“强番”临境这一残酷的现实，中国人更加牢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训。在剿之不尽、无计可施之下，明朝政府唯有采取权宜之策，选择澳门半岛开埠给在东南沿海流窜的葡萄牙人，设立关闸及采取严密的军事防范和控制措施，便是这一信念的充分体现。

为何选择澳门？我们认为，澳门半岛的地理位置是决定性因素。一方面，它与大陆相连，离商贸重地广州不远，方便与经济腹地联系；另一方面，莲花茎又利于军事控制和防范。1574 年于莲花茎“茎半设闸，官司启闭”，以别华夷。对明廷而言，关闸的另一重要作用是在双方有争执、冲突的情况下，切断对澳门的

^① 金国平、吴志良：《“食人生番”说之辨析》，载《东西望洋》，澳门成人教育学会 2002 年版，第 247—258 页。

供应，以最经济的手段迫使葡人就范。后来历史发展反复证明，这是中方的“杀手锏”，其威力之大抵过千军万马。此外，澳门自1535年起已辟为对外船口，亦具备商港的条件。

中国素称“天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则是当然的普世共主。教化蛮夷是“天朝”义不容辞的责任，而蛮夷则有向慕中华、定期朝贡的义务。最初的中葡关系便是在此格局下展开的。尽管不知道“佛郎机国”何在，虽然典籍不载，明朝官员却理所当然视之为贡国或意欲入贡之国。葡人亦乐意接受之，甚至梦寐以求。然而，朝贡制度已名存实亡，且夷犯处处，在华夷观念体系中，开放后的澳门可视为一个“常驻朝贡团”，既能时刻体现天朝抚恤外人、怀柔夷狄之恩德，同时又满足了一种无内在价值的政治虚荣心。无可否认，早期最“亲近”中国的葡人为维持他们在澳门的存在，也深明天朝帝国统治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模式，卑躬屈膝，奉行“双重效忠”，这又强化了中国人的华夷观念。

所谓的双重效忠，是居澳葡人一方面循葡萄牙中世纪的市政传统，组织议事会依葡萄牙法律和风俗习惯进行内部自治；另一方面，他们深明对天朝帝国的致命依赖性，遵守中国律例，对广东当局、特别是直辖他们的香山县政府恭顺臣服，并缴交地租，在澳门半岛上也基本上能够与华人和平共处，甚至通婚生子。除开下面将展开讨论的中国国防需要、中葡经济互利两大因素以外，葡人政治双重效忠的灵活变动原则，是葡人在澳门得以长期生存发展的根本。

本来，“天朝物产丰富，从不假外夷以通有无”，天子更是“富有四海”。对天朝来说，朝贡贸易不是单纯的商业交换，而是赋予了它一种抚恤外夷的政治涵义。不知从何而来的佛郎机竟然

巧妙地打破和“创新”了朝贡贸易体制，获得了任何传统上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周边国家都未曾获得过的特权，据有天朝一隅，大发其财，而客观上整个中国经济也通过澳门与世界接轨。换言之，澳门是明朝当局在不改变总体闭关自守政策的前提下、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实行局部开放措施的自然结果。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已经意识到，地理大发现开启了我们如今才切身体验到的世界化的进程。海外大发现时代西方的重商主义与东方农业社会之间的社会发展差异已不是地区发展的差距，而是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的“时代差距”。在这个意义上，澳门是早期全球化的结晶。如果没有澳门在中西两个世界中的接驳和缓冲作用，中国与西方的鸿沟和冲突无可避免地会更大。从中外历史的互动性来看，如果没有澳门的出现，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或许不是现在历史的过程与结构，世界不是今天的世界，中国不是今天的中国。这样说似乎有些夸大了澳门的历史作用，但仔细回味一下，不难发现确实如此。

通常而言，一个民族近代化的历程往往以认识世界、走向世界为其先导。欧洲的近代化正是文艺复兴与海外地理大发现的结果。在中国近代史上，澳门本来是国人了解世界、走向世界的—一个出发点。可惜的是，直至鸦片战争前夕，这点才成为国人的共识。

多年来，西方对明清以降中华民族的批评是“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时常有这样的疑问：从地理大发现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几百年间，中国为何对西方世界的巨大变迁茫然无知？为何对自身传统死抱不放、乐此不疲？近代化的脚步为何踟蹰蹒跚？

这种“停滞的帝国”论，起源于1793年英国女王遣华使节马嘎尔尼的印象。他认为，中国历史的演进的唯一动力是皇帝的

死亡或被推翻，无任何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的变化。显然，此种认知与历史的真实大相径庭，但它却深刻地影响了两个世纪以来的中外关于中国的史学视野，成为一种定见模式。

总体而言，封建时代的中国文化可被定义为一种呈封闭形态的、结构趋乎超常稳定的单纯文化，即儒家文化。在这种文化的主导下，帝国近、现代化步伐缓慢，但并非万古不变。澳门的出现及顽强的生存，不正说明了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吸收与相容？如果说中国完全“闭关自守”、“故步自封”，那么在欧洲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曾否出现过像中国领土上的澳门这样的城市？澳门的开埠及其几百年沧桑，树立了中国开放性格的巍巍丰碑，虽然在这个具体事例上，不无被动性和应对性。

传统观念认为，中国乃“中心之国”。在中国历史上，逐鹿中原是大小皇朝的心愿和宏图，因此，天朝中心观在所难免，但帝国也有对外开放的性格，有对外交往的需要和欲望。从汉朝起，中国人已经有了生存的危机感，开始与外部世界联系，张骞通西域，广州通夷海道，两条丝绸之路，宋代的海外贸易，元朝的洲际扩张，郑和下西洋，这无一不是中国历来开放的实例。此后，中国历史上才出现了周期性的封闭。黄仁宇将其总结为，明清王朝从外向走向内向，由扩张性的第二帝国过渡到收敛性的第三帝国。而澳门开埠于收敛性的第三帝国，其被动性质不可避免。

但是，应该承认的是，华夷观念淡化了中国人的危机意识。即便澳门开埠后，由于居澳葡人奉行“双重效忠”，也没有改变这种状态。通常而言，危机意识是指一个人、一个集体或一个民族的思想、信仰、生存、地位等受到威胁时产生的一种不安全感。葡人攻占马六甲，特别是抵达广州后，造成了中国近代史上

第一次由西方人引起的危机感。明朝统治者虽然产生了某种忧虑感，但并未上升到危机意识的高度，因为在其主观意识里，中国是拥有赫赫天威的上国，佛郎机这群化外生番虽然不得不防，但不足深惧。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化外蛮夷进入中原大地且为所欲为，才成为了一种全民性危机感。此种危机意识的唤起，导致了19世纪末期的争取中华民族自强的“洋务运动”。可惜，“洋务运动”生不逢时，清朝不久灭亡，继之是中华民国初创时期的混乱、抗日战争的残酷，国共内战结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人民才“站起来了”。可惜，又发生了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直到十年浩劫之后，中华民族才再次感到自己落后于世界的危机。正是这一种新的强烈危机意识，使得邓小平毅然拿出了开放、改革的大手笔，选择了香港对面的深圳和与澳门相连的珠海作为试验区，把中国引上了一条再次全方位振兴发展、重返国际社会的康庄大道，中国从此为之大变，世界也因此受到深刻影响。

我们不知道，澳门是否为现代中国改革开放、设立特区带来“灵感”，但是，汤开建称澳门为“三百年的天朝‘特区’”却贴切至极。

三、澳门起源的原因、澳门港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

有人说，葡萄牙帝国是历史的最大的谜团之一。时至今天，这个谜团还没有解开；时至今天，虽然相关的论著汗牛充栋，但葡人如何能够进入澳门并据居数百年的历史，也仍有不少待解之谜。

多少年来,“驱盗说”^①、“霸占说”、“受贿说”等不同观点和演绎曾经在澳门史学界风行一时。暂且不论这些论说的出发点如何,在某一时代,总难免受其时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影响和限制。如今,中葡两国已经和平友好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澳门特别行政区已经成立,此时此刻,再也没有政治、外交或意识形态因素影响我们客观、科学、实事求是地探讨澳门历史的各种问题,而近几年来以澳门基金会、澳门文化局(学会、司署)和东方基金会带头推动的中、葡文大量源文件文献的系统整理和出版^②,更加为解开澳门历史研究的大小谜团创造了充分的必要条件,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有利工具,为澳门史学研究的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大大拓宽了史学者的视野,更新了我们

① 金国平:《Tchang-Si-Lao 其人、其名文海钩稽——“海盗说”溯源》,载《澳门研究》第9期,1998年,第70—109页,后收入《中葡关系史地考证》,澳门基金会2000年版,第61—100页。另见金国平:《驱盗与葡人入居澳门》,载《军事杂志·葡人在东方特刊》,总第2364期,1999年第1期,里斯本,1999年,第199—228页。最新的全面论文,可见汤开建的新著《委黎多〈报效始末疏〉笺正》,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② 档案史料为认识与解读澳门历史事实的可靠途径,因此学界予以高度重视。关于澳门历史及中葡关系史料集已拥有一个相当可观的书目,共约4万页。根据不完全统计,除开澳门文化司署在1996—1999年出版的在葡萄牙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多部档案目录和澳门基金会、澳门大学1995年再版的《蜜蜂华报》(葡语,1卷,294页),澳门基金会、教育暨青年局1995年再版的《大西洋国》(葡语,3卷,2244页),澳门基金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再版的《知新报》(汉语,2卷,2088页),澳门基金会1998年再版的《新生》(葡语,6卷,3136页),澳门官印局1998年再版的《澳门档案》(葡语,4卷,1385页),澳门基金会2000年再版的《杂俎》(葡语,6卷,3387页)外,已出版的书籍还有28部(参见本收前言的附录书目)。此外,澳门理工学院、北京大学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正在出版有关澳门和中、葡、西关系的史料,金国平正在整理、翻译早期西方文献中有关中葡关系和澳门历史的记载,将分卷出版。上海在出版“道契”史料,第1卷已面世(蔡天育主编:《上海道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准备单独出版的葡萄牙及巴西卷,将有许多关于葡萄牙、澳门及巴西侨民在上海的数据得到披露。

澳门的理解。再者，虽然从近五百年世界史走向来分析，葡人1553—1557年据居澳门似乎是西风压倒东方的必然结局，但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来看，明中叶以后帝国尽管由极盛走向衰落，可其绝对优势仍然是葡萄牙以及西方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换言之，澳门开埠必有内情。这样，更加激发我们去探求澳门起源的真正原因。令人鼓舞的是，工夫不负有心人，近年澳门史学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首先，澳门的各种称谓的渊源及相互关系得到了厘清。

利玛窦与罗明坚合著的《葡汉字典》记录了澳门在16世纪末的中外名称：

“Maquao=蚝镜澳”^①。

西方语言系统的澳门称谓的确源自《粤大纪》中所标示的“亚马港”，但汉语中与“亚马港”对应的称呼却是“蚝镜澳”。这种同地异名现象，真实反映了澳门这一东西交汇之地文化融和过程的特色。

（续上注）最近杨开荆大胆提出了“澳门文献学”的构思，并对其进行了较充分的学术论证。我们完全认同她“‘澳门文献学’是‘澳门学’的根本科学”的结论，这完全符合无史料便无史学的基本原则。杨开荆所著《澳门特色文献资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及澳门基金会联合赞助出版）大大丰富了我们作为澳门历史文化遗产重要部分的多语种、多藏地的澳门档案的认知。澳门回归前至今出版的大量关于澳门的著作、论文可谓汗牛充栋。据查灿长的统计，至2002年12月30日，有关澳门的汉语专著有2600多部、论文6300多篇。我们认为，应该编辑一目录索引工具书，并适时出版中葡或中英版，将这批时间不长却已成为澳门文化历史财产一部分的作品介绍给国际学界。

① 利玛窦、罗明坚：《葡汉字典》，葡萄牙国家图书馆、东方葡萄牙学会、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旧金山大学）2001年版，第169页。对当时葡语语音的分析，可见梅斯纳著，韩晓燕译：《第一部葡萄牙语——汉语双语辞典》，载《文化杂志》中文版第48期，2003年冬季，第189—194页。

“蚝镜”与“海镜”是一种动物，其学名是日月贝。

现在通用的名称“澳门”，起初是指马阁山及对面山之间的水域。“澳门”最初为普通名词^①，后才成为专有名词，从清朝开始流行。

其次，关于澳门正式开埠的年代，葡人传统的说法是 1557 年。一份 1622 年的葡语文献对此作了说明：

“为了双方和好，各自得益，我从此处（澳门）的长者、故人及其他人那里仔细询问到过去和现在的事情。我得到的情况如下：首先，大约 104 年前，葡萄牙人开始与华人贸易。这在 1518 年左右，当时的正德皇帝是万历皇帝的曾祖父。起初的 47 年，部分时间在上川，部分时间在其他港口，一直缴纳常规的船税。此后，在浪白浮交易。1555 年，被获准前往参加广州的交易会贸易和纳税。时至今日，已经 67 年。1557 年，中国国王的执法官（Magistrados）迁往澳门港（porto de Machao）。65 年来，给了他们（葡萄牙人）地方居住。从此，（葡萄牙人）每年两次前往广州缴纳船税和为印度与日本的贸易参加交易会并向（中国）国王缴纳本城每年的 500 两地租银。从那时起至今，我们一直缴租。104 年来，葡萄牙人与华人交易，从未对王国做过坏事，也从未让人怀疑过他们的忠诚。众所周知，葡萄牙人居留澳门之后，也多次表示对（中国）国王及其官员的忠诚和效忠，因而中国官员不仅对他们赞赏有加，还给予

^① 金国平、吴志良：《澳门今名推陈》，载《镜海飘渺》，澳门成人教育学会 2001 年版，第 218—227 页。